

《中国观察·椿桦专栏》

“最短命学校”揭示畸形的利益观



面对平民的重重阻力,拆迁者尚且能做到临危不惧,更别说政府投资规划的项目了。“最短命学校”背后,当然有“规划短视”的因素,但更多的,恐怕是畸形的利益观和扭曲的政绩考核机制在作怪。

印象中,拆迁所针对的基本都是老房、危房、旧房之类。但谁会想到,刚刚建好的新房子也要拆呢?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月26日报道,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的现代化小学,刚刚全部完工即面临拆迁。有网友称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是“史上最短命的学校”。

其实祥坂小学犯不着为此特

别难过,一方面,拆了之后必然还得重建,没准还能盖得更好呢;另一方面,比祥坂小学更短命的建筑多了去了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前几年的重庆隆盛大厦,许多业主刚刚拿到钥匙还没来得及装修,就收到了拆迁的通知。

通常来说,拆除合法建筑,是需要勇气的,特别是拆除刚刚建起来的合法建筑。但显而易见,许多

地方政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足够的抗批评能力,是无惧于拆合法建筑的,名正言顺的理也好找:譬如重庆隆盛大厦这个位置要建“鱼洞长江大桥”;而福州祥坂小学的拆迁,则是因为该小学的位置太好了,建中央商务区最合适不过,学校似乎配不上这个位置。

“最短命学校”背后,当然有“规划短视”的因素。你硬要批准人家在规划好的位置建项目,如果不是智商低于公务员的招录要求,那一定是不正当的利益观或政绩观在作祟。前者的可能性不大,至于后者,不正当利益观与政绩观之所以形成,随意性的拆迁习惯功不可没。

诚如大家所知,在公民合法物业面前,拆迁者的破坏力既干净利落,又显得轻松自如,这都是

拆迁随意性的一种表现。面对平民的重重阻力,拆迁者尚且能做到临危不惧,更别说政府投资规划的项目了。可以想见,福州祥坂小学拆起来会显得更加快捷,几秒钟的爆破即可搞定。但是这样轻松的拆迁并不意味着没有抵抗—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临时校舍上课的学生,那些为新校舍建设贡献了血汗钱的当地纳税人,他们的内心肯定在反抗,毕竟,公共建筑也属于公民的合法财产。

实在不想老生常谈什么行政问责,决策失误追惩等机制了。我想,只要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,任由它在不受监督约束的状态下扭曲变形,拆迁的随意性就一定会更大,更短命的建筑也一定有大批机会诞生。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《第二落点》 学校为商务区让路,悲剧啊!

1500万,像打了水漂一样说拆就拆,纳税人的钱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挥霍掉了。网民们虽然很愤怒,但决策者们是否会被追究并不确定。“拆了建,建了拆”的城市经营格局并不鲜见,很多城市中的马路隔三差五地被“开膛破肚”,就很说明问题。

很多时候,城市规划的程序中极少看到普通人的身影,市民的权利诉求基本都是出现在规划成

型之后。如果福州市在最初规划阶段让公众参与讨论,这所投资1500多万元刚刚建好的小学还会面临被拆的命运吗?

当百年学校遭遇中央商务区,让道的为何偏偏是学校?这样的规划理念到底透露着什么样的信息?商务区可以带来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,带来GDP的增长,这些“显性”增长的诱惑远远超过了当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。在经

济增长与发展教育之间,城市规划也显得如此势利,毫不犹豫地倾向了前者。如此抉择,让人不无悲哀地看到,教育的重视在很多地方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号中,一旦遭遇其他发展商务区之类的对手,教育几乎没有任何博弈能量,只能委屈地让路。“最短命学校”的遭遇之所以让人心有不甘,除了对那巨额1500万投入的可惜,以及对教育重视的不够之外,好

歹这还是一所有着一百年历史的学校,即便从保护城市“历史”的角度来看,相关决策者们在做出拆迁这一决定时,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顾忌吧?!

“最短命学校”最终是不是会被PK掉,前景不容乐观。如果它确实需要为所谓的重点工程建设让路,那么,有谁能来反思一下学校的建设与维系不是一项重点工程吗? (陈方)

《第三只眼》 “最短命学校”疑似被开发商规划

拆掉史上最短命的学校,是要打造一个如今很时髦的中央商务区。那么,啥叫中央商务区呢?中央商务区简称CBD,一般均位于城市的黄金地带,集中了大量的金融、商贸、文化、服务以及大量的商务办公和酒店、公寓等设施。其显著的优势就是地价最高。

哦!再多的质疑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吧!拆掉学校打造中央商务

区,最终目的之一是不是要规划出黄金房价并带动周边的房价啊?

黄金房价当然得由开发商来“开发”打造,于是,我联想到了去年的一则旧闻: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说,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,一是行政干预过多,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。他说,目前土地开发机制混乱,城市用地开发本应由规

划指导,但现在往往由开发商指导规划设计,包括在什么地方开发,怎么开发,开发成什么样子,有部分开发商甚至设置了自己的规划设计机构。名为参与,实为操纵,正正经经做规划就难了。

请宽恕我的质疑:最短命学校的凄凉命运,是否又是“被开发商规划”的下场?如果背后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左右和“规划”,规划

是不可能朝夕改的,那么,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,极可能就是能够暗地操纵规划的开发商们。没准,由开发商指导规划设计,在什么地方开发,怎么开发,开发成什么样子,他们早就胸有成竹。事实上,当地政府与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后,城市“被开发商规划”,早就已操作得轰轰烈烈,各地企不下的房价,就是最好的说明! (吴杭民)

《热点纵论》

“不务正业”的央企都必须回归主业

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,今年起在央企范围内开展非主业宾馆酒店分离重组工作,计划3—5年内完成。(1月26日《新京报》)

现在“不务正业”的央企越来越多。有关数据显示: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0家央企中,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。其中,保利、远洋、华润、中房等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。央企的三心二意,不仅偏离了角色定位,更重要的是打乱了中国经济布局。

央企“不务正业”至少有三害。一是影响主业发展。央企作为国民

经济的支柱,不但承担着经济责任,而且还承担着社会责任。只有专注、坚持发展主业,专心于主业的技术、产品、商业模式的创新,在本行业做强做精,企业才能健康成长,才能为国家多交税多交红利和解决就业。然而,不少央企主业务绩一般,而副业却风生水起。这让人忧虑央企能否担当好企业责任。

二是影响其他行业公平发展。央企由于可以顶着国家的信用从银行低息贷款,利用资源优势可以从4万亿计划中分“一杯羹”,利用垄断地位可以获得不错的利润,

因此,央企携带资金优势、权力优势无论进入哪个行业,都会打破这个行业的平衡。比如,央企进军楼市,推动地价、房价上涨,不但对民企不公,而且加剧了购房人的负担,如目前火热的海南楼市就有不少央企参与吹泡泡。

三是央企“不务正业”有风险。众所周知,央企是全体国民投入的资产,盲目投资扩张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,毫无疑问损失的是股东(公众)的利益。据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披露,金融危机中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

浮亏114亿元。这就是“不务正业”所带来的恶果,最后为巨额亏空和损失买单的只能是公众。

在不久前国资委召开的央企业绩考核会议上,有关负责人强调央企要做好风险防范,要慎重进入股市、房地产和期货等高风险领域。其实,不仅股市、房地产和期货存在投资风险,央企偏离主业所搞的副业,由于是“门外汉”其实都潜伏着不少风险。让“不务正业”的央企退出宾馆酒店业还不够,所有的央企都应该回归主业,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。(冯海宁)

《热点纵论》

“吃狗肉犯法”让动物保护成了无厘头

我国首部“动物保护法”已改为“反虐待动物法”,4月将向相关部门提交专家建议稿。专家建议稿中规定,违法食用犬、猫肉,将处5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日以下拘留。监管方面,由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管理,公安机关须设立统一的报案电话。

(1月26日《重庆晚报》)

据一些门户网站调查,“禁食猫狗肉”的立法建议得到了多数网民的赞同。这在情理中,在网上投一张赞同票,既不需什么成本,又可以显示自己呼吁保护“动物福利”的时髦与爱心,为什么不呢?

我想起一则段子:现在的一些白领,在网上会为一只受虐待的小猫小狗义愤填膺或哭得泪水涟涟,可一回到现实中吃野味时,筷子夹得比谁都勤……这虽是段子,却形象地描绘出了当下那些热衷动物福利之人在“知”与“行”上的分离——喊保护动物的口号时,比谁都热心;可一旦体现在行动上,又不自觉地当起了饕餮之客。

所以,对“禁食猫狗肉”之类的立法建议大可一笑了之,即使在时髦人士的鼓动游说下,它最后真的被列入法律条文中,其意义也只限于文本中,很难对现实

生活产生作用。这是因为,“吃猫狗肉罚款拘留”在我国还缺乏必要的生活基础,相反,“冬天进补吃狗肉”的养生理念却深入人心,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,这吃法是否文明暂且不论,想凭区区一部反虐待动物法,就让人们中止这饮食习惯,一个字:难。总不能吃口狗肉就把人给拘了吧。

食客们很容易找到反驳理由,让立法者陷入悖论当中——吃猫狗肉违法,那吃猪肉牛肉呢,不是要保护动物吗,怎么只保护猫狗?如果所有非珍稀动物都禁食,大家喝西北风去?

造成以上这些尴尬的根源在于,禁食猫狗肉之类的法律条文,完全脱离了现实,只是专家的自说自话,所以必然流于口水。

这不是说动物不要保护,而是说凡事有轻重缓急,当“人的福利”堆积着这样那样急需解决的问题时,“动物福利”立法也就显得与现实脱节,它迎合的只是某些专家的空谈。

可以立法禁止虐待动物,但立法禁止吃猫狗肉,还是免了吧。不然的话,一部本来挺严肃的法律,搞到后来成了无厘头,那法律的面子就没处放了。(修仰峰)

《公民发言》

“好贪官”是个什么官?

山东潍坊中院公开审理了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善武受贿案。孙善武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,一边大肆受贿人民币910.49万元,一边狠抓城市建设且因政绩突出有所作为,落马之后,仍被洛阳人认为是“好贪官”。

(1月26日《新华网》)

常听见人们把官员分为清官、贪官,是次很多人以“好贪官”来定义孙善武,是不是在犯糊涂呢?孙善武在洛阳任职期间,以实干家的姿态,在旧城改造、洛南新区开发上,大刀阔斧、雷厉风行;但他同时又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。实际上,“两面派孙善武”人们从未混淆,且都已形诸口碑。比如,“孙善武之前,中州路十年都打不通,孙善武来了,三下五除二就打通了”;再比如,民间赐予的“孙善扒、孙大扒”绰号。

不过,一个官员如此集善贪和实干于一身,多少也是对传统认知的一种颠覆。民众将其定性为“好贪官”,更是折射出了民意的一种无奈。其实,官员不必担心为民办实事得不到好报,因为民意总是最为透彻的。在民间,“有一善,从而咏歌嗟叹之”的传统从未中绝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比如,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,尽管退休已18年,但是人们仍然能从寿光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餐馆、商店里看到百姓的爱戴。退一万步讲,哪怕是贪官,但你干成了事,善良的老百姓仍然能功过分明地区别对待——“好贪官”孙善武就印证着这种民意的善良。当然用“好贪官”评价孙善武,在惋惜之余,也着实有点怒其不争气:你就不能干干净净地干成事吗?这同时也意味着,现在能干事的官员,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;而又能干事又很干净如王伯祥者,显然是凤毛麟角了。

“好贪官”再好也是贪官,决不是好官。其作为一种畸形的样本,既是孙善武个人的悲剧,也是干部监督、干部成长值得解剖的一个“麻雀”。一句话,缺少制度约束和纪律监督,从好官滑向“好贪官”,决非偶然现象。(严辉文)

《公民发言》

发行教育彩票是个馊主意

有公开报道显示,全国高校贷款规模已经在2500亿元以上。面对巨大的财务负债,有政协委员建议:应尽快开展教育彩票发行试点,弥补教育经费严重不足。(1月26日《重庆晚报》)

众所周知,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资金,继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。可是现在倒好,提议发行教育彩票非但不是为了让贫困学生上学,有书可读,反而是为了高校还债,这难道不就是一个馊主意吗?

事实上,高校的大门有多气派,设施有多豪华,堆起来的债台就有多高。当初,为了追求大而全盲目扩张,疯狂“血拼”,如今债务缠身,就想到了教育彩票,要掏彩民的钱包来埋单,这个如意算盘未免也打得大响了。

既然发行教育彩票为高校还债的法子根本不靠谱,那么高校面对巨大的财务负债,又该怎么办呢?办法并不是没有。比如,增加学费。可问题却是,大学学费之高已经让人难以承受,再往上涨万一招不来学生岂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?

这就让人想起张磊日前向美国母校耶鲁大学捐款888万美元的事。折成人民币,仅张磊一个人的教育捐款就将近6000万元。如果我们的大学也能吸收到张磊、李磊、陈磊们的校友捐款,最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育经费严重的现状吧!可是,如果我们的大学拿不出能够让张磊、李磊、陈磊们感觉到“改变我一生”的做法,恐怕也只能像寒号鸟一样,整天“哆哆嗦嗦,哆哆嗦嗦,寒风冻死我,明天就垒窝”的悲惨吧!

面对巨大的财务负债,寄希望于教育彩票,如此心态,已经跟赌徒没什么区别。(从建锋)